

灰色地帶威脅 全境入侵

擴張始終是亙古不變的人類本性，
侵略方式已由實體轉至虛擬，
並延伸至日常；當敵暗我明，
以「話語權」奪取「制腦權」時，
我們要如何辨識與防禦？



如何判定來自「混合型戰略」 的「灰色地帶」威脅？

◆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 譚偉恩

若細究「混合型戰略」(hybrid strategy or hybrid warfare)的實踐，文獻上有論者認為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¹(Peloponnesian War)時期，人類的軍事衝突就已具有一定程度之混合性。

定性「混合型戰略」

學者 Giegerich 在探討「衝突」本質的變遷時指出，「混合型戰略」帶來的挑戰是多面向的，並且其核心動能是來自軍事以外的場域。²不過，對於究竟什麼是「混合型戰略」，Giegerich 並未在其研究中說清楚、講明白；事實上，雖然通說見解將

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行動視為「混合型戰略」的代表案例，但迄今為止，「混合型戰略」的定義並未在學界形成共識。為處理此一問題，同時避免陷入定義之爭的窠臼，本文嘗試釐清「混合型戰略」的本質，避免讓這個概念在理解上陷入近乎無

¹ 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在西元前 430 年，持續 27 年，主要係以雅典與斯巴達為首的「古代世界大戰」。雅典以民主制度聞名，與斯巴達的獨裁專制形成明顯對比，最後由斯巴達獲勝，雅典的黃金民主時代結束，並導致古希臘文明滅亡。

² Bastian Giegerich, "Hybrid Warfare and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flict," *Connections*, Vol. 15, No. 2 (2016): 65.



文獻上有論者認為最早出現一定程度的混合型戰略為伯羅奔尼撒戰爭。

所不包的情況。本文認為，「混合型戰略」不宜只聚焦在客觀可見的各種非軍事手段上，而是應關注軍事或非軍事手段由什麼樣的行為者執行（誰），以及在什麼場域裡被執行（哪裡）。

進入 2022 年之後的國際衝突必然有更多機會以複合式的多態樣混合型式呈現，因為主權國家已積累太多發動衝突的經驗，所以衝突活動的本身不太可能只包含了一種敵意行為，而是漸漸成為常規武力、非常規武力、非武力以外的其他行動，還有正規武裝戰鬥員與非正規武裝戰鬥員的總合。³ 有論者將「混合型戰略」定義為，把各種可能引發衝突的手段或政策融合到

一個特定的時空環境中。在這種時間與空間場域內，發動衝突的一方根據自己的客觀能力與主觀偏好，彈性調整施用的衝突手段；有時垂直調整（強度的大小），有時水平調整（手段的多樣性），有時以正規軍事行動引發衝突，但下一秒旋即改以非正式的非軍事手段。更重要的是，無論採取什麼形式之手段，都可以讓目標國承受損失或感到威脅。⁴

然而，如果依照上述定義，「混合型戰略」與「第四代戰爭」（the fourth generation warfare）的區分會變得困難。⁵ 如果只是透過有無利用一些高科技，將原本

³ Frank G. Hoffman, "Examining Complex Forms of Conflict: Gray Zone and Hybrid Challenges," *Journal of Complex Operations*, Vol. 7, No. 4 (2018): 31-47.

⁴ David Johnson, *Military Capabilities for Hybrid War: Insights from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in Lebanon and Gaza* (Santa Monica, CA: RAND, 2010).

⁵ 「第四代戰爭」一詞首次出現在 1989 年學者 William Lind 等人合著的論文，是在「人力」、「火力」、「機械力」以外的新型戰爭模式，其特色為暴力手段的多样化結合非暴力手段的多目標性（或稱不特定性），並且時間通常是十年以上。詳見：William S. Lind, et al., "The Changing Face of War: Into the Fourth Generation," *Military Review* (1989): 2-11.

不是傳統正規戰爭會使用的方式應用到國與國間的正規軍事衝突上來區分這兩者，顯然是不精確的判斷。職是之故，較佳理解「混合型戰略」的切入點是將之視為一種影響國家安全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側重於對「戰場」的全新掌握，而不再只是聚焦手段上的多元或複雜之正規與非正規衝突方式的融合。換句話說，是衝突行為的發動方根本性地將「戰場」概念做了擴張。

以許多文獻均提到的俄羅斯在烏克蘭之例來看，戰場不再限於陸面上的軍事衝突，因為俄羅斯設法將常規手段、非常規手段和各種其他非軍事性手段統籌起來，

同時與非國家行為者一起使用武裝軍事設備、虛假的宣傳活動、網路攻擊，甚至是能源外交。此種衝突手段多元且戰場不限於實體陸地上敵對行為之作戰方式，不僅減損了烏克蘭的安全，更令其他國家感到一定的威脅性。⁶

研判「混合型戰略」的簡易流程

根據前一部分的闡釋，在 2014 年俄烏衝突的例子中，「戰場」這個概念在時間與空間上有所擴張。詳言之，除陸面一觸即發的軍事衝突外，也包括其他空間已發生或可能發生的衝突。毋寧，俄羅斯將它



「混合型戰略」的切入點是將其視為一種影響國家安全的大戰略，側重於對「戰場」的全新掌握，而不再只是聚焦手段上的多元或正規與非正規衝突方式的融合。



俄羅斯花費大量金額在資訊媒體上，透過媒體宣傳虛假訊息，影響全球民眾觀感。（Photo Credit: InformNapalm, <https://informnapalm.org/en/how-much-does-the-russian-information-war-cost>）

⁶ Ofer Fridman, *Russian Hybrid Warfare: Resurgence and Politic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混合型戰略」中，衝突的場域不再侷限於傳統定義的戰場，而是可以深入民間日常生活的任何環境中，所以經濟、文化、宗教、輿論等各種平時活動也可能威脅到國家安全。簡言之，若在日常環境中受到威脅，甚至是實害，吾人便可以確定敵國施行的「混合型戰略」正存在於本國。

的衝突行動多樣化，同時將「戰場」的時間與空間加以擴張。在此種操作下，「混合型戰略」的實踐就會與非武裝衝突期間的日常生活發生交集，將戰時與平時之間的界限模糊化，這也是「灰色地帶」形成的根本原因。更確切地說，在「混合型戰略」的影響下，國家經常是陷入威脅無所不在與風險無時不存的情況。⁷ 準此，過去有明確軍事活動範圍的戰場空間擴延到戰場以外的其他時空中（無論是實體的或是虛擬的），並包括所有國家可動員與使用之手段，以及所有可以讓這些手段發揮損害敵國利益的行為者。

在這樣的理解下，本文將「混合型戰略」的判斷切割為兩部分：一、國與國間衝突類型的多樣性與交疊性；二、「戰場」空間或威脅環境之日常化。第一個部分是指涉衝突過程中一系列用以損傷敵國利益



或影響敵國的策略或手段，其特點是多種不同損傷國家利益方式的相互融合，並透過科技的加持而得到加強的破壞力。據此，如果一國採用正規的軍事衝突，「混合型戰略」的具體展現就會具有以下特徵：發生在傳統「戰場」的時空中，但手段可能不限於軍事攻擊，而是可能包括非軍事性行動。第二個部分則將「戰場」從傳統時空擴展到日常生活中那些已經面臨威脅或即將遭逢威脅之環境，國家的軍隊和非國家行為者以多元的方式來實現干擾和損害敵國利益的戰略目標。

從上開說明觀之，「混合型戰略」可以細分為兩類，一類是手段上的多元性與行為者的非正規性，但衝突的場域仍是可

⁷ Murat Caliskan, "Hybrid Warfare through the Lens of Strategic Theory,"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 35, No. 1 (2019): 40-58.



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書中的戰略思維對於中共發展「混合型戰略」影響甚深，其強調在時間上把敵對性的衝突行為加以延長，直到所企求之目標達成為止。（Photo Credit: Cangminzho, <https://w.wiki/4rT9>）

以被客觀劃定明確範圍之戰場。此種類型大致與第四代戰爭相似。對比之下，另一類除了手段與行為者皆有軍事與非軍事，正規和非正規外，衝突的場域不再侷限於傳統定義中的戰場，而是可以深入民間日常生活的任何環境中，所以經濟、文化、宗教、輿論，乃至於各種其他平時性活動也可能成為導致國家利益受損的成因。因此，「混合型戰略」的本質是大戰略，而非一般傳統上狹義之軍事戰略；大戰略和一般戰略之間的分野就是「戰場」的空間範疇是包括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環境，如果這些環境受到威脅，甚至是實害，吾人便可確定敵國施行的「混合型戰略」存在於本國。

在「戰場」這個傳統衝突空間中，國家權力的展現，還有軍事工具的使用都會非常明顯，非國家行為者與非軍事工具的存在反而變成次要（如間諜行動）。但如果是在日常生活環境中也開始受到大戰略行動的威脅或實害，導致日常生活中不安全的風險增加，特別是受到非軍事及非正規行為的衝擊，進行「混合型戰略」的研判工作就變得非常重要。

「混合型戰略」下 臺灣面臨的灰色地帶風險

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書中的戰略思維對於中共發展「混合型戰略」影響甚深，⁸而毛在時間上把敵對性的衝突行為加以延長，

⁸ Anthony Cordesman and Grace Hwang, "Chronology of Possible Chinese Gray Area and Hybrid Warfare Operations," CSIS (July 2, 2020), via at: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ronology-possible-chinese-gray-area-and-hybrid-warfare-operations>

直到所企求之目標達成為止，這種衝突行為若結合本文前述的分析，可約略推知中共「混合型戰略」之特色為：一、當正規戰獲勝的機率低或無法確定時，藉由長時間但低成本的連續不規律衝突活動，耗損目標國的資源與戰力；二、衝突手段多樣化，從軍事到經濟，從傳統戰場到生活日常，甚至可以從實體到虛擬（如網路戰）；三、以人為本，專注於影響和控制百姓，而不是目標國的官員或領土。⁹

透過「混合型戰略」的操作，中共得以藉助許多非軍事行動侵害臺灣的權利與利益，但因為表象上與軍事活動無涉，發生場域又不一定是戰場，導致臺灣國安機構在判斷上和反應上面臨灰色困境，並可能錯過最佳防衛時機。國防部《110年國防報告書》中便提及類此情況。報告書中特別提及中共以網路媒體為平臺，輸送大量真偽混雜的假訊息，建構臺灣民眾錯誤認知或干擾政府

與人民間的相互信任。¹⁰ 此種「混合型戰略」充分反映本文論及的兩項重點：一、使用先進科技將戰場的時空進行擴張並且虛擬化，但產生的實際損害或威脅減損了臺灣的利益；二、使用不具武器形式的假訊息分化臺灣內部的團結或弱化社會和諧。

鑑於中共已向我國施行具體之「混合型戰略」，且未來類似情況發生的機率很高，藉由參考本文提及的簡易判斷流程，或許可能提升對此種戰略的研判與分析能力，包括縮短反應時間，加速因應之決策程序，還有建立公私協力聯繫點，以優化我國抗衡中共投射假訊息等灰色地帶風險。



⁹ 這一點最值得留心，因為非傳統安全研究中的「人類安全」也是以人為中心，但「混合型戰略」也是以人為中心，故而可以說是從國家構成要件的根部去瓦解一個國家，是自下而上（from bottom to top）的大戰略。

¹⁰ 《中華民國 110 國防報告書》，網址：<https://www.mnd.gov.tw/NewUpload/歷年國防報告書網頁專區/歷年國防報告書專區.files/國防報告書-110/國防報告書-110-中文.pdf>



認清中共對臺 「認知戰」和防範之道

◆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 董慧明

2010年上映的一部美國科幻動作驚悚電影《全面啟動》（Inception）開場對白中這樣問到：「最有韌性的寄生蟲是什麼？是細菌，還是病毒？其實是一種想法（Idea），不僅韌性強，還具有高度傳染性，一旦占據大腦就幾乎不可能根除。」

這段經典臺詞在 10 幾年後的今天，不再是劇情想像。因為一場以人的心理認知為場域的安全較量已真實地在你我身邊上演。上至國際關係，下至人際關係；無論是和平還是戰爭、衝突，策動的一方透過設計一套能夠瓦解目標對象人心的故事，透過文化力量、資訊優勢去操控特定群體

的意識形態，這就是當前最受人關注和議論的「認知戰」（Cognitive Warfare）。

這種在全媒體時代興起的認知領域安全威脅，伴隨著資訊和網路科技快速發展之勢，靈活地利用社群媒體平臺去影響和滲透人的心理、思維邏輯、價值觀和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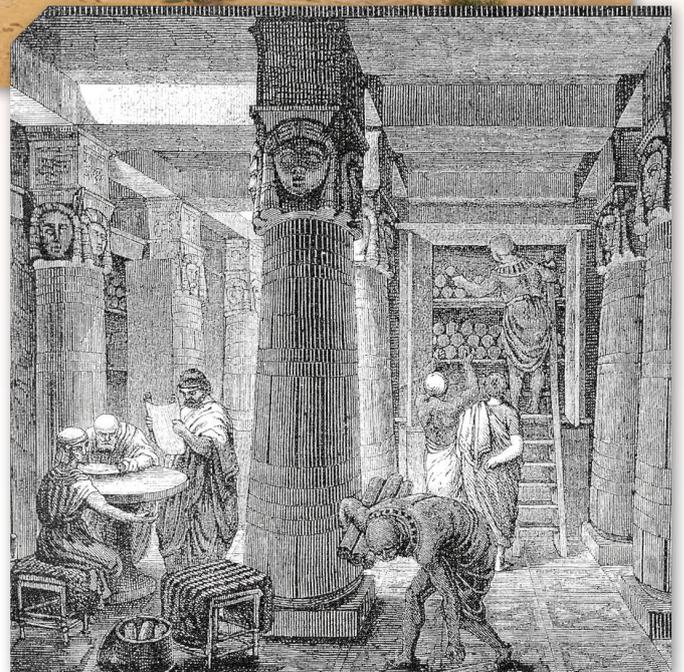


波斯贏得公元前 525 年的貝魯西亞之戰（Battle of Pelusium）被形容為是一場由貓決定勝利的戰役；左邊是由坎比塞斯二世（Cambyses II）率領的波斯軍隊；右邊是由普薩美提克三世（Psametik III）領導的埃及軍隊。（Photo Credit: World History Encyclopedia, Illustrated by Simon Seitz, <https://www.worldhistory.org/image/13914/the-battle-of-pelusium>）

感知。在潛移默化下，毋須動用兵戈，即可擾亂公眾輿論、主導民意傾向，甚至顛覆一個國家。「認知戰」的破壞性強、危害大，在近年來已成為各國高度關注和防範的重點。

攻心為上的「認知戰」

「認知戰」概念的發展其實由來已久，甚至打從人類有交戰行為時，就已經知道如何運用心理威脅或是混淆視聽的方式去動搖敵軍，取得戰場優勢。因此，從古至今，不分東西方國家，皆有經典案例可稽。例如：早在西元前 6 世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因為知道埃及人崇拜貓神芭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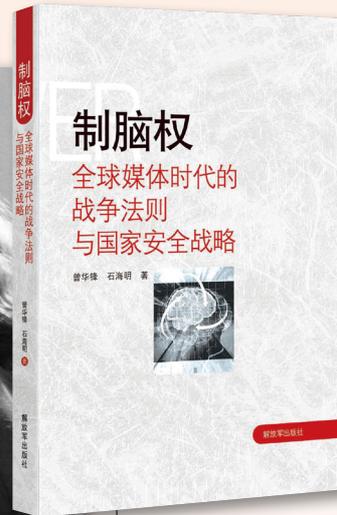


亞歷山大大帝在征服西方世界後，將希臘文化帶至各地，古希臘最重要的圖書館即興建於埃及尼羅河口的亞歷山卓城；古亞歷山大圖書館因戰爭遭火燒毀損消失，圖為根據史料繪製的圖書館內部想像圖。

特（Bastet），就在盾牌上畫上貓，讓埃及戰士在戰鬥中不去瞄準它們；而亞歷山大大帝在戰勝後，也不會急著摧毀敵人的城市，反倒是留下部隊去宣傳希臘文化，將手下敗將轉化為帝國賢臣。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利用廣播電臺大打心理戰；圖為二戰期間美國 FBI 的廣播操作情報員。（Photo Credit: FBI, <https://www.fbi.gov/image-repository/radio-operator.jpeg/view>）



《制腦權：全球媒體時代的戰爭法則與國家安全戰略》是瞭解中共操作「認知戰」的重要文獻之一。該書提到：媒體影響公眾話語權，透過對精神資訊的操縱，可在人們大腦中建構起一個現實世界的鏡像，人們多半生活在這個符號建構的意象世界，只是大都渾然不覺，而這個空間即為認知空間。（圖片來源：解放軍出版社）

另外，回顧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百家爭鳴、戰火頻仍，因此曾發展出著名的兵學經典《孫子兵法》，強調「詭道」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等攻心戰術戰法。到了秦漢時期，儘管形成大一統的天下國家體制，也慣用檄文、戰表來揭露敵人罪狀，達到先聲奪人的效果。

到了近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像是同盟國、軸心國之間利用廣播電臺大打心理戰，抑或是於 90 年代，美軍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出動廣播電視心戰飛機，對伊拉克發動密集的心理攻勢、製造敵軍內部恐慌等，都是經典案例。

近年來，這種攻心造勢的戰術戰法已升級至「混合戰」(Hybrid Warfare)、「認知戰」的全面運用。其中，中共將「認知戰」視為「制腦權」的爭奪，且以「話語權」作

為奪取「制腦權」的關鍵。話語作為文化的重要內容，可建構社會事實、建構思想，甚至建構人的身分；話語更具有操控力和影響力，只要運用適當的科技，透過議題設置、制度規約、技術規制，便能占領認知空間的制高點。基此，中共認為將先進的資訊製造技術、資訊傳播技術和心理影響技術應用於宣傳和心理戰作為，便能夠在認知空間贏得「制腦權」，不戰而勝。

中共「認知戰」手段與危害

2021 年 11 月，我國防部公布新版《國防報告書》，針對安全威脅部分除了指出共軍現代化軍事能力逐漸提升，對臺軍事作為更趨頻密和強硬外，亦特別提醒中共對臺操作「灰色地帶」威脅態樣愈趨多元，其中亦包括「認知戰」危害。為了造成對

其有利之態勢，中共透過「外宣模式」（如官方媒體）影響傳統媒體閱聽者；「粉紅模式」（如五毛、水軍）影響廣大民眾；「農場模式」（如新聞內容農場轉貼分享）、「協力模式」（如統戰模式下的協力關係）影響特定民眾。

這四種對臺「認知戰」的進攻模式，具有大量迅速產生、多元管道傳播、逼真細膩包裝、真偽夾雜混淆等假訊息特點。以共軍操作、運用「認知戰」為例，包括以中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為領導的各級宣傳部門、網路輿論部門，以及職掌共軍「網路戰」、「心理戰」、「電子戰」的戰略支援部隊，甚至是投入大腦控制武器研究的共軍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等等皆屬重要單位。這些單位雖然分屬不同體系，職能各異，但是在進行「認知戰」中卻分別負有指導、研究和執行的重要角色。此外，中共利用「融媒體」進行多重管道的特定訊息散布及操作，進而滲透、

分化民眾的社會、心理、法治等價值觀意識，造成國人心理紛擾、混亂，最終實現「不戰奪臺」的目標。

中共諸般對臺「認知戰」手法，涵蓋了「情報戰」、「心理戰」、「輿論戰」原理，綜合運用「三戰」作為，透過文攻武嚇、軟硬兼施手段，對我國家安全帶來嚴厲挑戰。檢視我國家安全局近年公開中共及境外敵對勢力對臺遂行「認知戰」情形可知，其採取的手段包括網路駭侵、散播爭議訊息，結合中共「大外宣」政策及統戰滲透。中共以刻意扭曲、直接做假、分化挑撥、威脅恫嚇為手段，變造、扭曲我國爭議事件，改變國人認知，目的在製造臺灣社會對立，分化民眾向心。



2021年11月，國防部發表《中華民國110年國防報告書》，內文首度提及中共對臺操作「灰色地帶」的威脅態樣，其中包括四種模式的「認知戰」危害。（資料來源：國防部，<https://www.mnd.gov.tw/NewUpload/ 歷年國防報告書網頁專區 / 歷年國防報告書專區 .files/ 國防報告書 -110/ 國防報告書 -110- 中文 .pdf>）



非辨勿聽、非辨勿言、非辨勿動。（圖片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防範因應對策

從「輿論戰」、「心理戰」，到「資訊戰」、「認知戰」，中共在各種無形作戰能力的研究和發展進程中可謂一脈相承且從未間斷。為有效反制，我國家安全局曾提出包括：貫徹依法行政原則、厚實網路防禦能量、熟稔敵我優劣態勢、尋求國際友邦合作、截長補短主動出擊等防範中共對臺進行「認知戰」之建議作法。而包括提升民眾資訊識別能力、強化假訊息管理機制訂定等公私協力作法也同樣重要。除了建立認知安全素養外，強化網路治理和數位監理機制，透過立法、修法填補現

行規範不足，健全媒體和民眾遵循資訊安全和社群媒體使用良好習慣，皆是防範中共對臺進行「認知戰」最基礎卻也必要的因應作為，有待相關單位和全民建立共識和落實。

另一方面，「認知戰」不僅只是安全威脅的防禦議題，更是對敵戰前致勝的關鍵。尤其，當前各國重視對「認知戰」的研究，不僅在釐清威脅來源和操作手法，更要善用高速資訊系統運算能力特性，運用大數據和輿情分析技術，及時掌握、判斷，進而精準反制。這種「算」中取勝的「認知戰」發展趨勢，一方面是要提升「不



戰而屈人之兵」之作戰層次和致勝機率；另一方面則是在靈活運用電子通訊、電腦資訊和人工智慧等尖端核心技術能力，取得智慧化戰場優勢，深值重視。

結語

中共善於利用民主國家制度的透明開放特性，滲入社群媒體平臺，操作網軍帶風向，控制目標受眾心理，混亂目標對象的社會、心理、法治等價值觀意識。加上眾多在國際上壓縮臺灣生存空間、拉攏臺灣企業及民眾、擴大對我軍事威懾等手段的綜合運用，皆是我國必須設防的「認知戰」重大危害。

《孫子兵法》有云：「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一個國家戰略認知空間的失守，勢必造成嚴重後果，必須在思想、文化、制度和心理等方面構建起國家認知領域安全的立體防護網。面對中共在「認知戰」研究領域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之發展趨勢，我國除了要洞悉其戰法和運用模式，更要積極聯合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國家緊密合作。最後，落實國安、政府行政部門間合作，並且和媒體等相關產業、學術界、研究單位及公民組織團體，形成跨領域的支援和聯防協調機制，此點同樣至關重要，必須全力以赴。

「銳實力」或「巧實力」？ 中國大陸發展路徑 為何處處受到質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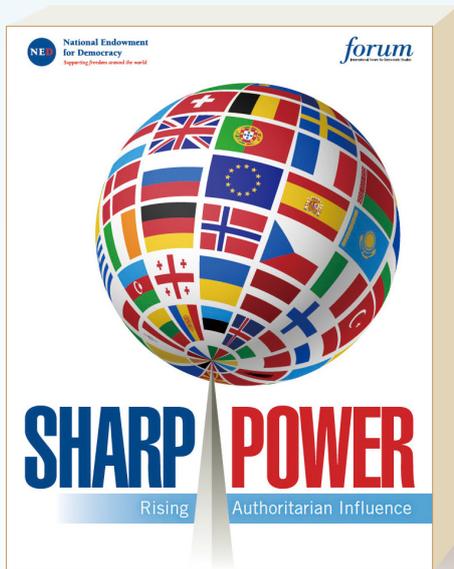
◆ 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 — 黃奕維

近年中國大陸在國際上的各種行為，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反感。

中國大陸亟欲塑造良好國家形象 備受考驗

在文化層面，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在海外大力投資推動外國人學習中文以及中華文化，被視為北京增強「軟實力」的舉措，但近年來有孔子學院被指干預學術自由，進行情報蒐集等工作；外交軍事方面，

中國大陸的「戰狼外交」，以及共軍機艦頻頻在南海、東海、日本、臺灣周邊敏感地區試探各國的底線，引起區域緊張；「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效備受質疑，甚至讓沿線國家背負鉅額債務而出賣主權或關鍵基礎設施；更不時傳出中國大陸試圖透過賄賂他國政治人物影響政策的醜聞。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於 2017 年出版《銳實力：崛起中的威權影響力》，研究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如何暗中影響拉丁美洲及東歐國家；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亦於同年以中國大陸的「銳實力」為封面故事，指稱其對外影響力的新樣貌。（Sourc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ull-Report.pdf>;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2017-12-16>）

銳實力與巧實力只在一線之間

美國《外交事務》雜誌 2017 年 11 月刊登「銳實力的意義：威權國家如何投射影響力」一文，銳實力（Sharp power）一詞被首次提出；2017 年 12 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出版論文集《銳實力：崛起中的威權影響力》，主要研究中共和俄羅斯如何暗中影響拉丁美洲國家（秘魯、阿根廷）及東歐國家（波蘭、斯洛伐克）。此後經過英國《經濟學人》、奈伊（Joseph S. Nye）等西方主流雜誌及知名學者的詮釋後，銳實力一詞成為西方分析中共對外各種作為的主要概念。中國大陸對此稱呼甚表不滿，提出「睿實力」做為反制。¹

歸納學者的定義，銳實力是指特定國家運用媒體、文化、教育、資訊等軟實力資源和收買、審查、操縱、脅迫等硬實力手段對他國施加影響的一種方式，此概念最常被用來分析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的各種作為。相對銳實力的則是巧實力（Smart power），係指在硬實力、軟實力之後第三種國家實力，是「牽涉到外交、遊說、斡旋、示威、影響等有效率又合於情理法的策略運用」，換言之，巧實力是所有軍事和外交手段雙管齊下、軟硬兼施的策略能力，此概念則以美國最具代表性。

從前述的概念界定，要嚴格區分一個行為是遊說、斡旋，還是收買、操縱，難度

¹ 中國大陸稱的「睿實力」，兼具中華文化智慧和道義感召力一即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理念的內容與合乎輿論傳播規律和受眾需求的手段之間有機結合起來的思維模式一作為在「新全球化時代」改進對外傳播和公共外交工作、提升其有效性的行動指南。



銳實力的概念最常被用來分析中共與俄羅斯對他國的行為；而巧實力則是以美國為代表。（Photo Credit: The Presidential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https://w.wiki/4rYz>; The White House, <https://flic.kr/p/2mS3Xxa>）



很高。同一個行為，由不同國家採行，在分析上往往會出現不同的解讀，例如派遣機艦至各地航行，中共就會被認為是在挑戰各國底線、違反國際法、破壞區域穩定；美國則會被認為是在維護航行自由。對他國援助的行為，中共就被認為是在收買、賄賂、債務外交；美國則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為何看似相同的行為，大陸就是「銳實力」，美國則是「巧實力」？

以上案例最大的差異在於：行為者是「威權」、「極權」國家，或是「民主」

國家，其他對於行為的描述，僅是主觀的解讀。再深一層的探究，一個國家在國內外長期累積的「社會資本」，能否讓內部與國際社會信任，相信動機是「善」而非「惡」，成為最大的關鍵。中共的統治下，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日趨緊縮，民間社會空間受到壓制，竊取他國機密等事件層出不窮，失去國際社會的信任後，既使號稱「不干涉內政、沒有附帶條件」，較歐美「援助與政治改革掛勾」優越的援助政策，也會被冠上「債務外交」、「掠奪他國資源」、「迫使他國出賣主權」等罪名。

分析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巧實力，除強大的經濟、軍事、政治等硬實力支撐外，由強而有力的民間社會領軍的軟實力，是中共極度欠缺的部分，當今中共的硬實力在全球名列前茅，應無疑問，甚至引起西方國家極度的恐慌，認為即將遭中共超越。中共更頻頻以「東升西降」、「不必看白人臉色」自豪。惟若談到軟實力，中共恐

怕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中共的軟實力主要是依賴傳統中華文化，而具有特色的流行文化並不出色，中共缺乏如好萊塢般具有世界影響的文化產業，也缺乏類似風靡全球的韓流、日流的流行文化。最為重要的是，中共缺乏軟實力的核心要素，即中共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上無法與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結合。



中國大陸的軟實力主要依賴傳統中華文化，缺乏如好萊塢般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化產業，也未有類似風靡全球的韓流、日流等流行文化。（Photo Credit: Republic of Korea, <https://flic.kr/p/hPyCzn>）

此外，公民社會被認為是掌握軟實力的主體，而中國大陸的非政府組織及民間力量非常薄弱，加上改革開放後累積的環境問題、土地開發問題、食品及糧食安全問題、貧富差距、社會公平，加上侵害人權、控制言論、貪腐等問題嚴重，與中國大陸對外訴求開放、多元、和諧世界有極大的落差，因而更限制了中國大陸軟實力的提升。

生活價值的真正自信， 是軟實力有力的支撐

提升軟實力的最後一個關鍵，是對於自己生活價值的自信。2012年習近平主政後，提出「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認為「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最終目標就是「富國強兵，民族尊嚴，主權完整，國家統一」。中國大陸開始積極塑造中國崛起、西方沒落的形象，例如強調「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機制，都是為超越「西方利益觀和叢林法則」，打破不適合中國大陸的「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學說，完善長久被西方價值壟斷的世界。更誇口中國大陸提出的「中國方案」，不僅對中國大陸有用，對於世界都會有所助益，中國大陸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即將戰勝歐美代表的資本主義。

然而，中國大陸表面上看似對自身的生活方式與制度充滿自信，卻又時常藉由西方的「肯定」，來增強自我的信心，例如中國大陸學者將「中國夢」類比第16任美國總統林肯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認為「中國夢」是源於中國（of China）、屬於中國（by China）、為了中國（for China），「中國夢」是特色夢（中國特色）、亞洲夢（幫助亞洲抵禦西方）、普世夢（中國模式的普世性），協助世界擺脫西方中心主義。一方面強調東方對西方的優越性，卻又必須藉由攀附西方的概念，才能襯托中國大陸的優越。

而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在2020年曾刊載一篇〈近平同志強調要敢做時代的弄潮人〉的文章，稱習近平有「貴族氣質」，並表示「近平同志的貴族氣質，是骨子裡透出來的……無論是和英國女王乘坐皇家馬車，還是和美國總統歐巴馬、川普在一起會談，他的氣場都足以鎮得住場、壓得住陣。」姑且不論領導人有「貴族氣質」與中共以農民、工人支持起家的形象是否有違背，於描繪領導人的氣質時，需以氣場不輸「西方人」來比擬，凸顯對自身信心不足之心態。

中國大陸取得半導體技術 的新手法 私募股權基金併購

◆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研究員 — 楊宗新

智路公司已收購日月光在中國大陸設置之技術水準和出貨量均領先全球的4間工廠。這起交易，是否會造成我國關鍵技術流失及影響到產業競爭力，值得關注。

中國大陸政府被懷疑在幕後出資

2021年12月間，以半導體封裝測試聞名的我國科技大廠日月光集團宣布，旗下設置於中國大陸威海、昆山、蘇州、上海的4座工廠，以美金14億6千萬元出售予大陸「北京智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智路），後者於完成併購後將4座工廠更名為「日月新集團」。

由於坊間盛傳智路背後有中國大陸政府出資，加以該公司也曾在試圖收購美國

半導體廠商時，遭美國政府以國安為由阻攔。使得這起交易，有著造成我國半導體封裝測試技術與人員外流的高度疑慮，進而影響國家安全。

近年智路公司之併購案

智路創立於2015年，自公司成立以來，即專門鎖定半導體領域業者進行併購，且在併購的類別上，無論是晶片設計、代工製造、切割封測均來者不拒，被陸媒稱為「半導體大廠收割機」。



圖為被智路公司併購之日月光在中國大陸的威海與蘇州工廠（圖片來源：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日月光半導體\(威海\)有限公司/8048278](https://baike.baidu.com/item/日月光半導體(威海)有限公司/8048278)；<https://baike.baidu.com/item/蘇州日月新半導體有限公司/987493>）。

舉其近年著名的併購案例有：2016年收購荷蘭恩智浦（NXP）半導體的標準產品業務，這是大陸史上第一筆半導體產業的海外併購案，同時也位列2016年全球前10大併購案；2019年，智路獲得奧地利半導體感應器廠商奧地利微電子（AMS）主要股權，該廠是蘋果主要供應業者之一；2020年7月，智路併購德國西門子公司旗下傳感器製造公司 Huba Control Unit；2020年8月，智路收購位列全球排名第三的晶片封裝測試公司—新加坡聯合科技（UTAC）。

這些外國半導體企業遭智路併購後，常見的狀況是原位於國外的研究或生產中心會迅速被轉移至中國大陸，背後的用意推測是為了進行技術轉移。例如智路併入AMS後，雙方隨即於安徽滁州設置工廠；UTAC被併購的一個月後，就宣布在山東設

置工廠；Huba Control被收購不久後，便將部分生產線遷往四川。

智路公司的資金來源

智路在短短數年間，以橫空出世之姿於全球大肆併購半導體大廠，不免令人質疑背後是否有中國大陸政府的力量支持。綜合陸媒報導，智路係由「中關村融信金融信息化產業聯盟」所籌設的私募股權基金設置，該聯盟是一個經北京市民政局核准的非營利性社團法人，成員超過2百家企業，主要功能是對有需要的企業提供借貸，同時也自行募集基金從事投資活動，該聯盟的金融業成員中，包括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等，皆為大陸國有銀行，使得聯盟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



智路公司資金來源包括中共國有銀行，且公司成立後於短短數年內，即已併購多所半導體大廠，因此被質疑幕後有中共官方在支持與下指導棋，又被稱為「半導體大廠收割機」。(圖片來源：智路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wiseroadcapital.com>)

以私募股權基金為資本成立的公司，可視為一種新興的投資型態。這種公司是由多家企業共同集資成立，公司的資本來自各股權持有者共同籌措的私募股權基金，營利的模式則是透過併購其他公司獲利。由於基金募集時的非公開性，使得無論是這種基金本身或由此設立的公司，始終存在神祕感，外界無法得知其資本來源究竟為何。

陸廠併購行為逐漸引發他國憂慮

2021年3月，智路開價14億美元欲收購韓國晶片製造商美格納半導體在美國的所有股份，引發韓、美不滿，併購案功敗垂成，也是智路成立以來少數踢到的鐵板。

美格納原為韓國SK Hynix（海力士）旗下子公司，2004年10月被美國花旗集團旗下的花旗風險投資公司收購，但工廠及員工仍維持不動。該起交易案曝光後，許多韓國民眾擔心此舉將洩漏半導體技

術，於韓國總統府（青瓦臺）網站上發起請願，要求政府否決這筆併購。

美國方面，財政部所屬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也介入審查，並要求在審查前暫停併購，審查重點則在於併購案是否涉及核心技術，從而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風險。2021年8月，CFIUS宣布該併購案「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智路與美格納隨即要求撤回原併購案，請求重新提交，但之後仍再次遭到否決。

陸資併購行為透露的意涵

智路在數年內接連完成幾項重大併購案，至少傳遞出以下意涵：

一、反應中國大陸亟欲獲得半導體技術

儘管沒有直接證據能夠證明，但從許多跡象看，智路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完成多筆大型併購案，背後必有政府力量支持。

從時間點看，智路成立於 2015 年，中共國務院在 2014 年通過《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有意系統性地扶持半導體產業發展，並且設立領導小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國家總體戰略格局的高度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目標是在 2030 年追平國際水準。2015 年，中共國務院公布《中國製造 2025》規劃，試圖在 10 年內於 10 大關鍵技術成為全球領先者（為此投入總額近 4 千億美金），半導體產業也名列其中。

從組織看，智路雖是透過「私募基金」而成立的公司，但外界更相信，其之所以採取「私募」的方式，是中共政府希望藉由不需對外公開的特性，好讓官方資金能

進入其中，以便政府在背後下指導棋。再說，智路的資金來源「中關村融信金融信息化產業聯盟」是由超過 2 百家企業集資而成，其中不乏官股企業。

二、凸顯中國大陸廠商自製半導體的困境

依計畫，中國大陸企圖將晶片自製率在 2025 年提升到 70%、半導體技術在 2030 年追平國際水準，但成效明顯不如預期。根據中共官方數據，晶片自製率在 2020 年已達 30%，然依市調機構 IC Insights 公布的數據，中國大陸當年度晶片自製率僅有 16%，且排除外資在當地生產的數量後，實際可能只有 6%，要想達標並非易事，只好向外尋求解決方案。



智路公司於 2021 年欲收購韓國晶片製造廠在美股份時，引發韓國民眾抗議；後經美國 CFIUS 介入審查，認為此案會「對國家安全造成風險」，併購案因此告吹。（Source: 매그나칩반도체노동조합, <https://youtu.be/HnOCQr4UovE>）



然因半導體是許多科技產品的核心技术，即使友好國家之間，仍會相互提防，以避免技術外流。近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勢態，已讓西方國家滿懷戒心，更難以期待在半導體技術上對中共進行轉移。除前揭美國否決智路併購美格納的案例外，英國最大晶片製造商紐波特晶圓廠（Newport Wafer Fab）在 2021 年初遭中國大陸安世半導體併購後，英國政府隨即終止對該廠的補助，並在議會壓力下展開對該起併購案的審查。歐盟方面，也早在 2019 年就宣布將建立加強審查機制，成員國有義務報告任何機敏技術的境外投資，這些規範，被認為是針對中國大陸試圖併購歐盟境內半導體廠而設立的。

三、中共官方有意支持企業從事併購行為

近年來，中國大陸半導體技術的取得來源，已從臺灣擴及至全球。數據顯示，中共企業的海外併購行為，從 2009 年起，迄今均維持正成長，2015 年更是成長驟增的一年，併購總額從前一年的 4,309 億美元，躍升到 6,510 億美元，增幅達 85%，顯示政府有意支持企業從事併購行為。

在半導體產業，當年度最大的併購案，係紫光集團試圖併購美國 DRAM 大廠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 Inc.），經美國財政部審查後以國安理由拒絕。當時的美、「中」雙邊關係尚稱融洽，歐巴馬政府對中國大陸也抱持交往態度，但在半導體關鍵技術領域仍採從嚴認定。



2015 年，中共國務院公布《中國製造 2025》規劃，試圖在 10 年內於 10 大關鍵技術成為全球領先者，半導體產業也名列其中。（圖片來源：中新社／達志影像）



2015年紫光集團試圖併購美國DRAM大廠美光科技，經美國財政部審查後以國安理由拒絕；圖為美光科技產品。（Photo Credit: Micron Technology twitter, <https://twitter.com/MicronTech/status/1484617259666624527>）

此後，諸如智路等私募基金公司相繼成立，更是專責以併購國際半導體大廠為業。從併購行為的角度來說，這類型公司的成立，有兩項意涵：一方面，併購的主體從單一企業（例如紫光）變成多家企業在資金上的結合體，有更足夠的資金用來從事併購；另一方面，這類型公司的資本來源都是「私募基金」，表面上看似較紫光等同為半導體產業的廠商來得無害，實質上則可能有中國大陸政府在幕後操控的黑手，可謂包藏禍心。

各國政府應加強審查機制

中國大陸在半導體領域，屬於技術後進者，欲追平其他國家，人才吸納與海外併購是兩大重要途徑。過去中共企業在半

導體領域進行併購時，因欠缺協調統合，呈現雜亂無章、多頭馬車狀態，過程中也經常遭遇其他國家的阻力，引發國際社會反感，美、英、義大利等國相繼修法禁止陸資收購。而如智路之類以私募股權基金方式出現的公司，則可視為中國大陸政府有心以國家力量協助半導體產業進行海外併購。

這種做法，可謂利弊互見。利處在於，由政府幕後協助集資，同時計畫性地針對境內欠缺的技術挑選外企進行併購，是一般私人企業難以企及的；弊處在於，儘管這類公司打著私募股權基金的名號，但實際上政府在背後支持之情昭然若揭，勢將更加深其他國家在面臨陸資併購時的戒慎恐懼，使得往後的交易變得愈形不易。